

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

高冬梅

内容提要 救灾工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减震器”。抗战时期,面对大灾巨祸,根据地政府首先把救灾工作当作施政的重要内容,加强救灾制度建设。同时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一方面采取消极救济手段以解灾民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救灾措施以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卓有成效的救济工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作用,而且为建国后救灾体制的建构和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也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 救灾工作 社会功能

救灾工作是国家和社会为了减轻灾后损失和制止灾荒发生、蔓延而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是赈抚灾难、治国安民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和严酷战争环境使救灾工作一度成为关乎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一方面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互助互济;一方面组织广大群众,艰苦奋斗,生产自救,使救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本文旨在考察与分析根据地救灾工作的基本情形,阐明其政治、经济作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

抗战时期,由于根据地所据有的广大农村和一小部分城镇,就自然地理而言,一般地处穷乡僻壤,多山岳,少平原,交通不便,气候多变;境内河道年久失修,崩堤决水不断出现;致使根据地自然灾害的发生十分频繁。1937年到1945年,在根据地范围内,水、旱、蝗、雹等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39年冀鲁豫晋4省发生的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当时,晋察冀边区浊流肆虐,尽成泽国。残无人道的日寇又趁机决堤120处,致使边区17万顷农田被毁,损失粮食不下60万石,波及村庄近万个,仅冀西就坍塌房屋6万间,灾民达300万。1942年至1943年,中原地区又发生百年未见的奇旱,重灾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冀中地区,由春至秋,赤日炎炎,田地坼裂,苗枯禾干。1942年平均收成仅及常年的二、三成。单晋冀鲁豫边区的冀鲁豫区就有重灾村1050个,轻灾村580个;大行区需救济的灾民也达33.6万余人。1943年灾情荒情更加严重,旱荒继续蔓延,夏秋还发生了特大蝗灾、水灾。其中豫西、豫北蝗群遮日,遍野枯枝;冀南从1942年春到1943年8月,从未落过一滴雨,884万亩良田成了废地一片,8月后却又阴雨连绵,洪涝成灾,整个冀南汪洋一片,326万亩土地悉数被淹。仅左权、偏城、涉县、黎城、潞城、平顺等县,灾民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6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49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36页。

《冀南军民怎样战胜灾荒》,《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

即达 35 万以上。1944 年,未绝的蝗灾又危害了太行区 60 万亩良田。可见,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这近 3 年的受灾情形是多么严重!8 年中,陕甘宁、晋绥、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都遭受过罕见的灾荒。

自然灾害曾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困难,日寇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更使人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八年抗战期间,根据地一直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寇更是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从 1939 年到 1942 年间,敌人对根据地的大小扫荡达 540 多次。千人至万人的扫荡有 132 次,万人至 7 万人的扫荡达 27 次。1941 年和 1943 年,日军对北岳区的两次秋季“扫荡”,即屠杀边区军民 1.1 万余人,抓走劳工 2 万余人,烧毁民房近 30 万间,庄稼 5 万余亩,抢走粮食 10 万石,棉花 1.2 万多斤,牲畜家畜 20 多万头,毁坏农具数 10 万件,使军民罹病者 10 万余人。残酷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根据地的广大农村“从平原到山地,没有不被摧毁的村庄,没有不被抢掠的村庄”。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几被摧毁殆尽,有生力量锐减,元气大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就使连年的灾荒越发严重,情况异常恶劣。

在自然灾害和日寇烧杀掳掠给根据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情况下,敌特汉奸还乘机造谣、破坏、挑拨离间,使根据地的灾民们更感到惊慌失措。因此,能否实行有效的救灾政策和措施,拯救灾民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153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636 页。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1—62 页。

谢忠厚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8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 650 页。

于水火,成为中共和边区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而且成了关系根据地能否巩固、抗战事业能否坚持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后就一直在为实现包括救助贫困、改善民生的社会救济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把救济灾民、扶助贫弱作为施政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为改良人民生活,要“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抗战一定要有民生主义。陕甘宁、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淮北等抗日根据地政府制定的施政纲领中,都将救济灾民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其中晋察冀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对此规定的更为具体,指出要“设立专门机构,切实救灾治水,并发挥高尚的民族友爱的互助精神,以县或村为单位建立大众互济储蓄互相救济组织”。在实际救济工作中,中央和各根据地政府还经常适时提出具体方针。如1944年中央在总结各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富有建设性的指示:“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组织党内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政府关于救灾方针的制定,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在组织领导和机构设置方面,在抗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规定以各边区政府下属的各级民政部门作为救灾工作的常设领导机构,区、乡、村政权中的优待救济委员会是贯彻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7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落实救灾方针的基层组织。1945 年 7 月,为适应新形势,打破“区域所拘,物质所限”,实现救济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又成立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各解放区政府则都设救济分会作为其直属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救济机构的设立,为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救灾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如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多次发布救灾赈济指示,调动各方力量做好救济工作。大灾之年,为确保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地政府还临时组织由党政军民组成的各级救灾委员会,全力负责救灾工作;并把灾区村级党支部当作领导生产自救的核心堡垒;同时充分发挥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后合并为救联会)的作用,根据这些组织、团体的特点,把其工作重心放在基层,依靠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落实到群众当中去。在中共中央“推动士绅名流组织募捐及参加我们的各级救灾委员会”的号召下,士绅名流也经常参加救灾工作。这样,救灾工作变成了多层次指挥、多渠道援助、多部门协作的庞大工程,这无疑会有利于调动各方力量共渡难关。在对救灾工作的态度上,各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号召党政军机关和全体党员,认识灾荒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一个政治问题,号召协助和发动全体人员,用一切办法防灾备荒,战胜死亡威胁”。要求党员、干部“以儿子对待母亲的态度”对待灾区人民,把救灾渡荒当作灾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上这些政策、机构、心理方面的准备,亦即社会救灾体制的基本确立,开启了根据地救灾实践的序幕,为救灾工作的成功奠定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05 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9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8 页。

了良好的基础。

二

在根据地的救灾实践中,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消极救灾手段,另一方面又大胆探索,开创了新的积极救灾途径。其中根据地政府采用的消极救灾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力所能及地放赈救急

大灾之后,灾区民众嗷嗷待哺,发放急赈,以解灾民燃眉之急,便成为救灾渡荒的首要措施。根据地政府尽管财政拮据,也常发放粮款急救灾民。1939年晋察冀边府迅速拨款10万元给冀中等重灾区。1944年,晋绥行署为救济雹灾和收复区难民拨款125万元。

由于根据地所处环境异常恶劣,政府财力极其有限,最困难时,军民竟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所能提供的赈济粮款数目自然与灾民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因此,为做好救灾工作,根据地在如何有效使用有限的赈款赈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救济工作原则。一是重点救济、专款专用原则。根据地在发放救灾粮款时,“尽先以受灾最重又无生产力,到目前不能维持生活之抗属及赤贫民众为对象”,保证把有限的救灾款物用于最困难的地区,发给最急需帮助的困难户。执行中逐渐纠正了最初的“平均主义”、“普遍救济”反而急需救济者得不到救济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674页。

《晋绥行署拨款救灾》,《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1日。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674页。

的失误。同时,根据地政府还采取得力措施,严禁挪用赈款,保证把救灾款物全数用于灾民身上。二是民主评议原则。根据地政府在发放赈济粮款时,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每一个要救济者,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使确实困难的灾民得到救济,真正做到了公平合理。三是快捷简便原则。根据地政府在发放救灾粮款时,都强调这一点。晋察冀边府要求“手续力求迅速简便,分配力求适当,务期于最短期内胜利完成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要求“要抓紧放赈时间,很快的调查,很快的分配”。四是检查总结原则。为保证救灾工作的健康进行,检查工作效果,根据地政府经常派专人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待放赈完毕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随即总结工作,将书面总结连同救济清册三联单据呈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查。

以上原则的实行,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赈灾工作的集中性、时效性、公开性、公平性,使有限粮款的作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解救了灾民燃眉之急,稳定了灾民情绪,为进一步救灾打下了基础。

(二) 实行全面的粮食调控

粮食是赈济灾荒最重要的物资,各根据地在灾年首先加强了粮食贸易的统制。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曾规定,凡能充饥的食品如山药蛋、豆腐、粉条、瓜条、榆皮、糖、炒面等一律禁止出口,统一调剂辖区内的粮食,将轻灾区的粮食运到重灾区,普遍建立粮食调剂所,粮販售粮,须到指定的粮食调剂所或集市。为进一步保证粮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171 页。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674 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第 259 页。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674 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第 261 页。

源和粮食低价售给灾民,边府还采取妥善的经济手段,发动私人粮食上市,打击走私和囤积。同时积极动员商人、小贩到敌占区购粮,弥补粮源之不足。售粮时,边区政府事先将缺粮灾民人数及需粮数量,进行详细的调查评议和登记,按评议结果,发给定时定地使用的购粮证,粮食调剂所则按购粮证售粮。这些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灾区极为缺粮的局面,保证了最缺粮户能买到一定数量的粮食,缓解了灾情。

(三) 大兴社会互济运动

相期相恤、互助互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根据地政府意欲造就的新型社会风气。在根据地经济拮据的背景下,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社会互济运动在救灾中迅速发展起来。

1. 节约渡荒

灾荒年间,各根据地军民更无一例外地大兴节约,严惩浪费,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1942年至1943年,重灾的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相继开展节约救灾运动。以晋冀鲁豫为例,灾荒发生后,“党政军民先后提出每日节省小米二两、一两、五钱”。人民子弟兵率先垂范,实行了全军总动员,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每人每日节约小米1两,禁止用锅巴喂猪。一二九师还发出补充指示,规定办公、杂支、津贴费停发3个月,棉衣穿两年,夏衣穿1套,每日食粮后方机关由1斤6两减为1斤2两,战斗部队由1斤半减到1斤4两,结果,仅太行区部队就节约粮食和物资折合小米141.4万多斤。冀南军队厉行节约的同时,还连续两次精兵,“一部分从事开辟新的地区,一部分则转入生产”,两次精兵数目为原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39页。

同上,第148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672页。

数的一半。这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壮年劳动力。在节约的同时,根据地还严惩浪费。1943 年,太行区政府发布指示:禁止贪污浪费打埋伏现象,严格粮食收支,限制地方粮的征派,组织强有力的检查团深入检查粮食状况,对违令者,有权就地依法处理。晋察冀边区在节省运动中,要求按最低限度需要计划各级办公机关费用,严禁滥用公款,提倡简朴生活,戒绝奢侈浪费。在群众方面,根据地政府也大力号召“不浪费一粒粮食,不作践一点食品”,大力开展节约运动。

由于当时脱离生产的队伍庞大,根据地严惩浪费、大兴节约的渡荒运动,不仅大大减轻了灾民负担,而且节余出了大量赈灾款物,增加了救灾的物质力量。

2. 募捐救灾

募捐救灾是根据地经常开展的群众性活动。灾年,政府和群众组织募捐团、呼吁团,政府、军队、农村剧团普遍进行救灾公演。在非灾区提出“打破地域本位主义及落后的封建思想,关怀灾区同胞”等口号;在灾区提出“急公好义,仗义输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相助,邻里互济”等口号,进行宣传动员,掀起“一把米”、“一升糠”、及“一个窝窝”等运动。在募捐中干部以身作则,首先带头,人民群众随之纷纷响应。1939 年晋察冀水灾后,单晋东北、冀西、冀中就募款 62 万多元。晋冀鲁豫边区在 1942 年救灾中,募捐节约共得 126 万多斤小米,仅各军队剧团就募款 13.2 万多元,小米 353 斤,杂粮 4300 多斤,副食品 2000 余斤。除了本根据地募捐

《冀南军民怎样战胜灾荒》,《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4 日。

《太行根据地军民热烈动员急救旱灾》,《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12 日。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6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151 页。

外,各根据地之间还开展互相支援活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为救济晋察冀水灾募款10万元。1944年,华中盐阜区部队机关捐款16万元、粮食8千多斤,慰问华北受灾军民。各根据地开展的这种募捐支援活动,体现了根据地人民之间亲如兄弟的关系。

募捐与节约救灾一样,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救济灾民,使救灾工作建立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而且其政治影响及给受灾者的精神安慰与鼓励远远超过其物质援助本身。

3. 互调余缺

主要是指灾区农村的互相借贷而言。其做法是动员存粮富户,在灾情紧急严重时,把所存的剩余粮食,由政府出面作保借予灾民,含有周济与调剂的作用。群众间互调余缺,一般在行政村或自然村内进行。灾情较重时,也有以区或乡为单位的调剂。由于在政府辅助下坚持了有借有还、有本有息的原则和采取了诸如通过合作社吸收游资、再贷给群众等灵活多样的方法,群众间的互相调剂在救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42年旱荒时,晋冀鲁豫仅林县、武安、涉县就借到小米41万多斤,款3.7万多元,急救了成千上万灾民。1945年陕甘宁边区在救济春荒中,政府拨了4000石救济粮,而据不完全统计,延安等6县群众互济粮即达4200余石。这种互相调剂还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有利于农村互助友爱社会风气的形成。

此外,各根据地还根据各地不同灾情采取了减免公粮,派遣医疗队,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等其他救灾措施。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第586页。

《盐阜区各部队机关捐款十六万慰问华北军民》,《解放日报》1944年4月26日。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11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第350页。

以上措施救灾民生活之最急,在根据地救灾渡荒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晋察冀“三九年大水,是借粮和贷粮,节约救济而渡过的”。这些措施初步安定了灾民生活,维护了社会秩序,也体现了共产党与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切实关心,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和群众间团结友爱的精神,为灾民恢复生产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措施多为应急性质,绝大部分属于临灾治标和灾后补救,是立足于现有财富之上的消极救济。这对处于极其艰苦经济条件下和被重重围困环境中的根据地来说,不仅救济能力有限,而且只能是一时之效,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灾荒。

1942 年以后,受连续灾荒的袭击,各根据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人民逐步认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即只有把救灾工作纳入生产轨道才有出路。生产自救遂成为救灾工作的主要方式。

在积极救灾活动中,根据地政府依据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动灾民从事各种农副业生产,依靠自己的劳动克服困难。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兴修水利

旱涝灾害是根据地发生频繁且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出于工赈救灾的近期目的和防止水患、扩大灌溉面积的长远打算,根据地在生产救灾中首先领导人民大力兴修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1939 年水灾后,边区政府立即发出“彻底救灾治水”的号召,大的重要工程以工代赈;其他小型工程依据受灾情形,给予灾民相应的粮食补助;各地很快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经过数月艰苦奋斗,修堵大小决口 120 处,长 17479 丈;整修险工 53 处,长 2380 多丈;复堤筑堤 39 条,长 528 余里;疏浚淤河 9 段,长 165 余里;共动用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744 页。

民工 69 万多名,修缮了历史上从未完成的——王岗、西里村决口。

在生产救灾中,根据地政府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仅领导人民积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而且事无巨细,象打井挖渠这样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1942 年,晋冀鲁豫边区积极开展抗旱活动。为动员民众打井,冀南政府规定:一个土井贷粮 80 斤,一个砖井贷粮 200 斤,提出“浇一亩,活一亩”等口号,掀起打井热潮。仅 1943 年,冀南人民就打土、砖井近 1 万眼,若按 1 眼井浇 6 亩地计算,可浇 6 万亩田地。勇于克服艰难险阻的太行区人民,从 1942 年到 1944 年,共修渠 14 条,长 122 余里,浇地 1.3 万多亩。其中,仅涉县的王口、黎城大寺和土遥 3 条大渠的修建,不但以工代赈救活 10 万人的生命,而且每年可增产细粮 98 万多斤。

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财力、技术所限,根据地人民兴修水利时只能因陋就简,离彻底消弭与战胜灾害还有相当距离。但大规模以工代赈的水利建设,不仅对眼下救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改善了灾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并为建国后的水利建设积累了经验。

(二) 抢种、补种、多种

恢复和扩大种植面积,是生产救灾的重要一环。为此,根据地政府还曾利用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机会,组织人民突击进行了大规模的抢种、改种和补种活动。如,陕甘宁边府曾多次发布指示,号召人们在灾期赶种“小日月庄稼”、挑水种瓜菜等。晋冀鲁豫边府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339、340 页。

《冀南军民怎样战胜灾荒》,《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4 日。

《晋冀豫与冀鲁豫救灾概况》,《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19 日。

也要求要“不荒一亩地,不空一茎苗”。水、蝗、雹灾刚过或旱天偶遇甘霖,各根据地政府马上组织人民抢种短期作物、晚庄稼和蔬菜,对无收成希望的地则改种或补种。在“多种一片菜,多吃一碗饭,多种一片菜,多解决困难”的口号下,地少的贫民及党政机关军民学团体还利用一切地边渠旁等废地抢种和多种适宜的作物。在生产中,根据地人民还大力开展劳动力、生产资料的互助合作运动。由于措施得当,号令一致,抢种、改种、补种,抓住了农时,形成了规模,从而弥补了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避免了大面积粮荒的出现。以晋冀鲁豫为例,1943 年秋,仅一、五专区即抢种、补种荞麦、萝卜等作物 15 万多亩,解决了当地近半年的民食,成为“渡过 43 年严重灾荒的一个决定环节”。抢种、补种、改种过程中,各边区人民还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争取高产。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北方根据地依据当地特点,贷粮调种,利用秋雨广泛抢种冬小麦,1943 年秋,晋冀鲁豫边区种麦面积比过去增加 25 %。来年丰收,基本解决了当地的军需民用。

(三)力战蝗灾

对向来最难制止的蝗害,根据地政府极为重视,明确提出“放纵蝗虫就是放纵敌人”,唯有迎难而上彻底灭蝗才是出路。一发现蝗情,政府即紧急动员布署,上至专署下至乡、村都迅速成立剿蝗委员会或指挥部,划分剿蝗区,千方百计动员群众参加打蝗战斗。在打蝗中,根据地干部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按照蝗虫的生活规律,摸索出挖卵、露捕、围歼、火烧、网捕、毒杀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蝗办法。针对蝗虫繁殖、蔓延速度快的特点,他们还确定“卵不变蛹”、“蛹不变蝗”、“蝗不产卵”,“发现在哪里就消灭在哪里”的方针,规定突击期,打破地域界线,于突击期内动员数村所有男女老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149 页。

幼,一齐动手,不分你我,块块包围,点点消灭。在打蝗战斗中,有的地方适时提出不同口号进行鼓动;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打蝗奖励政策;有的地方则采取定价收购蝗虫或以蝗卵换米的办法,鼓动群众打蝗和解决打蝗群众的生活困难。1944年是太行区蝗灾最严重的一年,根据地党政军民开展了7个月之久的打蝗运动,出动人力756万个,9月底彻底控制了蝗灾。据1944年2月统计,单安阳1个月就挖蝗卵2.8万斤。

(四)发展工副业生产

副业、手工业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小,方便灵活,是一种周期短、见效快的积极救灾措施。因此,根据地政府大力扶持农村副业和手工业,要求干部“要老老实实,熟知当地情形(原料、劳力、技术、销路等),往里攒”。即从当地实际出发,努力想办法,帮助灾民从事多种多样的工副业生产。当时,手工业副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原料缺乏和产品销售难。对此,根据地政府一是靠政府贷粮贷款解决,二是大力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如在纺织运动中,让合作社通过借贷、购买等手段帮助灾民解决吃粮、原料、工具等问题,使灾民从事纺织生产,然后合作社再将纺好的布集中卖出,发给灾民工资。由于劳力与资金、产供销的互助合作、有机结合,灾荒期间,运输、纺织、造纸、磨面、制毛、编制、榨油等工副业生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为群众谋了很大利益”。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运输业和纺织业。陕甘宁、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根据地都大规模开展运输、纺织救灾。1942年至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一、五、六专区普遍采用工赈形式组织灾民搞运输,其中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50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161页。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690页。

著名的太行运输队,靠运输费使 10 万灾民渡过了百年未有的灾荒。运输业算不上发达的太岳区,从 1942 年到 1943 年 1 年半中,也靠运输救活了 3 万多人的性命。男劳力从事运输业,女劳力则参加纺织。不仅原有纺织传统的冀南、陕北等地区的妇女用纺车向饥谨宣战,就是基础薄弱、原料工具都很缺乏的晋察冀边区的一些地方的妇女纺织运动也蓬勃兴起。1942—1943 年两年中,晋冀鲁豫的太行区组织了 15 万纺妇,纺花 120 万斤,赚了 3 万石工资米。1942—1943 年,晋察冀仅冀西就有纺妇 40 万人,曲周 1 县就有四五万妇女纺织,每月可得利近 200 万元。这不仅使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部分实现了自给,救济了灾荒,活跃了经济,而且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五)建立义仓

义仓救灾,古已有之。各根据地政府在 1942 年以后普遍号召各地兴建重建义仓,作为救济后备。1943 年,太行区政府号召“除争取村义仓普遍设立和整理外,还可酌量情形,建立县义仓”。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44 年也发布命令:“为防患于未然,各级政府应积极劝导人民创建义仓。”同年晋绥边区仅兴县建义仓的村子就有 429 个。在各地开办义仓运动中,有的地方开垦荒地作为义田,义田收入归义仓;有的地方于丰年时将农民“另碎存粮”入义仓。义仓存粮,粮食、糠菜各种食物不限,因而保证了一定的存储量。义仓的管理制度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一般村义仓由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158 页。

《晋冀鲁豫与冀鲁豫救灾概况》,《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19 日。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745 页。

《太行根据地军民热烈动员急救旱灾》,《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12 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第 356 页。

《晋绥行署指示各地普遍开义田办义仓》,《解放日报》1944 年 10 月 6 日。

村中“有威仪的”“公正人”组成委员会共管,县区义仓则归参议会管理。开仓借粮,须经管委会批准。抗战期间,和西县新建义仓 27 个,存粮 163 石多,麻饼 1000 多斤,糠 1.5 万斤,在 1942 年夏荒时,救济了 700 余人。平顺义仓屯谷 49.6 万多斤,全部启用,可供 1.5 万人 3 个月渡荒之需,由此可见义仓的救济作用之一斑。

在建义仓运动中,有的地方还把义仓发展为粮食信用社。农民以自己的粮食自愿入股,灾荒时,入股者优先取得红利,贫困者也可低利贷粮。粮食信用社具有义仓和信用社双重性质,不仅使入股者可保本获利,调动群众入股的积极性,而且具有储粮备荒和调剂互助的作用,变相打击了高利贷盘剥者,很受群众欢迎。

另外,为战胜敌祸天灾,根据地还开展了春耕运动,采集野菜、代食品的生产渡荒运动等。

三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生产关系下的救灾事业有不同的作用。抗日根据地成绩卓著的救灾工作显示了重大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过标本兼治的大规模的救灾运动,根据地人民不仅战胜了一次次巨灾,而且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灾最重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从 1944 年以后,生产下降的趋势得到控制,许多村庄秋后粮食满囤,且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各种副业,“如喂猪、喂鸡、养蚕、采药等,都有增加”。1945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625 页。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 739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204 页。

年 3 月太行区戎伍胜副主席如是评价救灾工作：“今天太行这样热烈的生产，一个重要因素，是从救灾中发展起来的。”1945 年，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较战前增加了 79.4%；民间纺织业，由战前的没有，发展到战后的纺妇 15 万人以上，织妇 4 至 5 万人，织布机二三十万架的局面。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战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达到丰衣足食。从前农村的主要角色是贫农、雇农，现在则变成了中农与富裕中农，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到 1945 年，19 个解放区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公里，拥有 1 亿人口，养活军队 120 万，民兵 200 万人。这些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救灾工作的成功，因为在根据地的建设史上，人民群众的一大半时间在与灾荒作斗争，他们兴修水利，开荒筑田，治理蝗患，发展农工副业各种生产，因此到抗战末期根据地的生产条件、农副业产值、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负担能力才有如此大的改观。这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根据地生产自救的积极壮举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自给自足小农个体经济的限制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为数不少的农民具有保守、狭隘、迷信的落后观念。根据地包括救灾在内的生产建设的积极壮举，开阔了群众的视野，改变了农民保守落后的意识。在打蝗运动中，一些地区的群众原来迷信观念严重，认为蝗虫是“神虫”，禳祭祈祷，求“神虫”饶恕。但打蝗战役胜利后，不仅庄稼保住了，群众对蝗虫的迷信观念也一扫而空。连冀鲁豫区的“神娘娘”李善人也认为蝗虫并非神虫，“烧香不顶用，不打真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第 201 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第 285、286 页。

不中”。在经常性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中,除政府发放急赈外,很大程度上是靠全社会的互助互济为灾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是组织起来发展工副业生产、兴修水利、杀虫除害等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强了群众彻底战胜灾害的能力;妇女走出家门,成为生产渡荒中重要角色等事实,加上改造二流子、懒汉懒婆,奖励劳动英雄等措施的推行,增强了群众的劳动观念和集体意识,形成了乐观向上、互助互爱、男女平等等良好社会风气。

(三)在救灾中,政府、军队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树立了军民共命运的典范。每当灾荒来临,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都省吃俭用,给当地灾民巨大的物质帮助;根据地的每一项救灾建设更都浸透了人民子弟兵辛勤的汗水。在晋冀鲁豫捕蝗运动中,太行区上至司令员、下至每个战士 7 万多人都参加了捕蝗,取得了捕蝗 14 万斤的重大成果。冀鲁豫区的一个团在 10 天内捕蝗 3.3 万斤,“不喝群众一口水,不吸群众一袋烟”。在冀南,当新春犁牛奇缺时部队除留少数战士警戒敌人外,其余都给老百姓拉犁,成了“光荣的犁牛”。灾荒期间,太行区部队创造了帮助群众耕地、锄地、收割合计达 4.39 万亩、其他帮工 5 万个的记录。人民子弟兵为救济灾民,发展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帮助灾民生产外,部队还自己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仅 1944 年的冀南、太行两地,军队开荒就达 10 万多亩,产粮 512 万斤,收山药蔬菜 1266 万斤,粮食自给 3 个月,蔬菜自给整一年,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四)根据地各项救灾政策的有效实施,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

《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5 日。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 671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 671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 670 页。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第 672 页。

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根据地的济难救灾史实表明,在灾荒年间,根据地不仅不象历史上和国统区那样:“灾荒愈发展,人民大众所受的剥削愈加强”,人与人的关系越恶化,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是恰恰相反,灾荒越严重,政府态度越积极,救灾生产越广泛,互助互济越深入,党政军民越是空前团结。根据地救灾的这种全新风貌,吸引着无数的敌占区国统区难民不顾一切地奔向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深切地感觉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外来难民也体验出“根据地是另一个世界”。“谁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解决了灾荒问题,谁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当然,由于时代所限,根据地救灾工作不免带有战时色彩;而且由于各根据地的经济条件与受灾程度不同,其救灾工作的具体情况自然也不平衡;根据地救灾中也存在诸如“平均主义”、“赔钱救灾”、“片面强调集体化”、个别地方大面积开荒不注意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足;所有这些也给当时的救灾事业和生产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综合观之,根据地的救灾工作在中国救灾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它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令世人瞩目的。

(作者高冬梅,1968 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